

# 江泽民德法并治思想的科学性思考<sup>\*</sup>

朱凌云

(淮海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 要** 江泽民同志德法并治的治国思想,是有其科学合理性的。德法并治的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积淀的“共时性”精神理念,符合民族文化秉性,切实针对中国现实状况,在深入揭示道德与法律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 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科学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5)02-0005-04

在现代社会,法制、依法治国已经被普遍认同为主导性的治国方略和价值取向,法治在政治、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法治并不排斥德治,倡导并实施以德治国并不影响法治的权威。对二者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sup>[1]</sup>依法治国应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法应该并举、并治,现已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江泽民同志德法并治的治国思想,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巨大反响和共鸣,为全党接受并确立为党的基本方略,这与其主张的科学合理性是分不开的。德法并治的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积淀的“共时性”精神理念,符合民族文化秉性,切实针对中国现实状况,在深入揭示道德与法律辩证

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功能、作用。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江泽民同志德法并治思想的科学性略作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

德法并治的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积淀的“共时性”精神理念,符合民族文化秉性。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渗透着传统文明的积淀。儒学由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影响更为深远。儒家主张“德治”,注重道德教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sup>[2]</sup>“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2]</sup>但儒家并不排斥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其一贯承袭的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常常把道与法、德与刑、礼与刑相提并论,认为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治内,法律治外,只有标本兼治,内外双修,才能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中国封建社会繁盛的盛唐时期,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一套封建道德体系;一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其目的是达到制礼崇敬,立刑明威。综观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嬗递演变,展现

<sup>\*</sup> 收稿日期 2004-11-24

基金项目 江苏人文社会科学指导性课题(OISJD710008)

作者简介 朱凌云(1970-),女,江苏靖江人,淮海工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两课”教学。

万方数据

在我们面前的治国理念,基本上是由广义的“德”、“法”构成的概念体系,而统治者治世的现实手段,通常是德法兼而施之,只取其一端的做法在历史上极少出现且不能长久。

漫长的理念灌输和施政实践,使得这种德法兼治的思想必然有所历史传承和心理积淀,并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渗入民族文化秉赋之中,通过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理性思索,体现到历代统治者的政策主张之中。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是我们现代人必须面对的,也必须有所取舍承弃。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德法思想,在本质上与现代道德、法制建设是相冲突的,今日之“德”与昨日之“德”,今日之“法”与昨日之“法”,有实质内涵上的不同,现代的道德法律“语境”已迥异于往昔。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只能是抽象的“文化符号”的延传,而不应是传统文化质的延续。但即便是这样,传统的思想仍然包含有一个民族对社会认识的阶段性成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社会发展的某种“共时性”的东西,仍然是我们今天道德法制建设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心理背景。“文化符号”也不是短期内能速成的,它也反映了一个民族长期的文化积累,也会在民族的心理和思维中长期存在下去,它虽然不能代替现代人思维上的现代内容,但能影响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心理体验和行为习惯。江泽民同志提出“德治”、“以德治国”,倡导德法并治,看似简单使用了传统文化中的个别词语符号,借鉴了历史上德法同构的思维框架,但实质上是对传统德法思想激扬清基础上的巧以利用,具有极强的历史传承性和民族针对性。

德法兼用,在中国之所以迁延数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和传统的“中庸”、“和谐”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价值观念一脉相承,具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力,并由此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久而久之,积淀为一个民族的文明要素,渗透到民族的思想中去,造就了与德法兼用观念相适应的文化土壤。具有崭新内涵的德法并治思想,具有正视本土文化资源的品格,是对整个民族扎根其上的文化土壤的正视和关注。我们相信,江泽民同志德法并治的主张,不但会建立在中国的现代制度之中,更会深植于每个血肉之躯的心坎里。

## 二

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现状决定的。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我国法制建设历程中的阶段性认识成果和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各个部门法的法律体系,并建立了各类执法机构和组织。但法律的实施并不理想,立法目的的实现往往步履艰难。譬如,刑事犯罪历年来呈现的高发态势,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反腐败尤其是司法腐败的种种情形,如此等等,看似是一个法制问题,其实并不尽然。犯罪分子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涉足腐败的官员的政策法律水平往往并不低,政府历年来的打击力度也很大,相关的制度也被大量地制订了出来,但这种明知故犯、知法犯法、执法枉法现象大量存在,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探究法律制度背后的精神因素。这种精神因素包括法律意识,但更重要的是道德观念。“无德”就会“无法”。没有守法这种基本的道德观念,要防止违法犯罪,没有官德要杜绝腐败,是很难做到的。分析违法犯罪分子的心理轨迹,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之前,首先是道德观念的弱化、错位乃至丧失。所以,不注重道德建设,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会在实施效果上大打折扣。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揭示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也证明了把道德建设提高到“以德治国”高度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对法律有一种天然的需要。这是因为,法律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各种利益、矛盾的调整,对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市场经济内部秩序和外部环境,维持经济运行的和谐稳定状态,均起着无可替代的支撑、保证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论断。这种说法固然是正确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他们的素养、意识、欲望、习俗、性情等主观性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市场活动行为,这就使得市场经济内含着对伦理道德精神的企盼,需要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和约束。首先,市场主体的外部活动,需要一套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来约束,诸如对财产权的尊重、诚实信用等。如果市场主体缺乏起码的道德标准,就会不择手段地从事各种牟利活动,使损人利己的行为泛滥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扰乱整个市场秩序。如果诚实守信不形成风气,就不可避免地增加猜忌、防范和风险,加大交易成本,降低效率。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也是由我国社

其次,市场主体自身要生存发展,道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主体,具有拟制的人格,同样需要一种道德品性来凝聚人心,维持其长远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社会道德在微观上作用于市场经济的体现。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竞争越是激烈,越是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越是要求市场主体提高道德水准,道德的作用也就日益强大。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状来看,主流是好的,但不讲诚信,不守合同,坑蒙拐骗,盗版泛滥,制贩假肥料、假药、有毒食品等现象大量存在,有的后果相当严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的缺失与伦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道德素养的提高和道德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紧迫,以德治国就凸现得尤为重要。

大力倡导以德治国,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不管是政治目标、政治理念还是政治制度,都包含着执政者的道德承诺和人民的道德诉求。古代有“以德配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sup>③</sup> (p.65) 的说法。而今,老百姓对执政者有更高的道德企盼,执政者需更具政治德性。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执政道德、政治德性的强调和重视。“德治”是一种统治手段,更是执政者统治合法性和人民认同感的基础。“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sup>④</sup> (p.213)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德治国对依法治国有着一种引领导航作用,以德治国更具基础性、战略性、方向性,对政权的兴衰存亡更具长久意义,正所谓法治治近,德治治远。

### 三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法律与道德辩证逻辑关系的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自身存在的既相互适应、相互吻合,又相互冲突、相互保持距离的特征,内在地决定了德法并治的科学合理性。

道德和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具有互补性。首先,道德是法律的价值标准。道德是人类正义精神的体现,它本身具有先在性、自证性和自为性,从而也就成为判断万事万物的第一价值标准。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它才成为法律规范制定和实施的价值基础,成为衡量法律自身合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只有合乎道德,反映社会基本的道德要求,才

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才能称之为良法而具有自身的合理性。相反,则被称之为恶法而受到批判和抵制。其次,道德和法律相互支持,其功能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撑,法律就会陷入瘫痪。因为守法是社会的基础道德。反之,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道德也会苍白无力。因为,法律对道德的支撑,一方面表现为一些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弘扬离不开法律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表现为德融于法的过程,即道德的部分原则、规范、理想上升为法律规范,依靠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得以实施。我国宪法第24条的规定和《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公平、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点。第三,基于法律的有限性,道德是法律的有力补充。法律不可能覆盖所有的社会领域,在许多法律达不到的地方,就需要道德补充调整,即“法律之所遗,道德之所补”。另外,人的主体性及道德法律在人身上的合一性,也是道德法律统一性的生动写照。一个特定的人,建立在道德和法律基础上的判断体系应是一致的,如果道德和法律在个人的精神体系内不能协调一致,那就是对人身的一种伤害,会使精神发生对立而使人产生痛苦。道德自律的增强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通过道德的内在引导和自律约束来增强履行法律自觉性的过程。

如果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道德和法律本质统一性的体现的话,那么,道德和法律在调控功能方面的差异性也是德法并举必要性的逻辑必然,而且这种差异性更是德法并治的最根本原因。

法律规范凭借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他律性。法律的调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和反对,都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来依法办事,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为主体的违法行为必定受到法律有形的制裁,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强制性。而道德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形式加以维持,具有自律性。道德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个人的内心感悟和素质水准。道德惩罚主要表现为自我否定和谴责,是精神上、思想上无形的惩罚。社会舆论的压力,只是在唤起羞耻感的情况下间接起作用。法律调整 and 道德调整,只有软硬兼施,彼此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调控系统,才能建立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

法律调整人的外部行为,对人的违法行为强制矫正,不制裁意识观念和纯粹的思想。而道德

不仅谴责不道德的行为 ,而且评价人们行为的动机 ,并通过人的内疚、自责、反省来改造人的思想 ,进而影响人的行为。在塑造人的行为过程中 ,单纯的德教和单纯的法治都是不可取的 ,只有内外结合 ,明暗呼应 ,才能实现优势互补。

法律的内容用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表现出来 ,具有稳定性 ,不因人因事因地而改变 ,执行过程都严格按程序进行 ,简单而有效。但这种稳定的形式合理性必然排斥特殊性 ,在个别情况下 ,会背离法律的初衷和根本目的。而道德很少有具体详细的道德规范和明确的表现形式 ,它可以因人因地因事而对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 ,能充分尊重人的个性特征。有鉴于此 ,就应当把形式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取长补短。

法律重在惩恶 ,以不违法犯罪为底线 ,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来控制社会秩序。而道德重

在扬善 ,遵纪守法是基本道德要求 ,但不是其追求的目标。法律重在制度建设与创新 ,通过立法打造出严密的制度体系 ,再用执法活动来维持这种制度 ,并力求塑造出制度上的特色来。而道德重在塑人 ,通过教育、说服、劝导、激励打造出人的品格、民族的品格来。从上述意义上讲 ,法律重在治标 ,道德重在治本 ,法律的作用立竿见影 ,道德的作用收效漫长。只有标本兼治 ,快慢结合 ,才能图谋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强调“ 依法治国 ”和“ 以德治国 ”相结合 ,是保持二者的特色、距离基础上的相互支持与补充 ,不赞同趋同。清醒地认识了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 ,就不应使道德法律化 ,更不应使法律道德化。这是因为 ,道德法律化会造成社会普遍的虚伪人格 ,而法律道德化更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是与现代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

[ 1 ] 江泽民.论“ 三个代表”[ M ].北京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3 .  
[ 2 ] 孔子.论语[ 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  
[ 3 ] 孟子.孟子[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  
[ 4 ] 苏轼.东坡七集·续集[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 .

# Reflections on Scientific Properties of Jiang Zemin 's Thought of Administering Country by Law and Morality

ZHU Ling – yun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of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

**Abstract** :Jiang Zemin 's thought of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by law and morality has it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operties . It inherits the spiritual idea of "synchronic property " that has accumulated and settled in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ty , corresponds with the cultural nature of the nation , and practically meets the real situation of China .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dialectical unity of morality and law , each of them gives full play to its own function and role .

**Keywords**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by morality ;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by law ;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operties